

电影界有“一片游”之说，指的是有人与电影仅有参与一部的缘分，比如《上甘岭》里女卫生员的扮演者刘玉茹，她在片子里唱了至今仍在流行的《我的祖国》（当然声音是郭兰英的），给观众留下鲜明的印象，但她那以后再没有在银幕上出现。我也曾“一片游”，玩得惬意，玩得过瘾。

那是 1983 年，当时我是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，忽然有一天电影局来人找到文联，说要借我去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，到法国去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。文联觉得奇怪，刘心武一个写小说的，怎么去参加电影节？那个时候文艺界人士出国机会难得，我 1979 年和 1981 年已经两次参加中国作协派出的代表团分别出访了罗马尼亚和日本，怎么还出国，而且竟是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去法国？

听到这个消息，连我自己也很惊讶。1982 年，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我的中篇小说《如意》，拍出一部彩色故事片，由黄健中导演，李仁堂、郑振瑶主演，我只不过是个原著者，虽然后来也参与编剧，但最早写出剧本的是戴宗安女士，完成片的字幕上，编剧是我和戴联署。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派黄健中，或者主演去。那时电影局局长是石方禹，他是个诗人，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的长诗《和平的最强音》影响很大。电影局到文联的人士就解释说，南特的三大洲电影节，举办主旨很好，就是当时欧洲的戛纳、威尼斯、柏林等电影节，都不怎么重视欧美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电影，所以他们要为亚洲、拉丁美洲、非洲的电影提供一个专门的平台，来展示其风采；这个主旨，我们应该支持；发起人是南特民间的两兄弟，后来得到市政府支持，1979 年举办了第一届，1983 年是第五届了，电影节主席副主席，那两兄弟，来北京选片，看中了《如意》，决定在庆祝电影节五周年时，在那一届的开幕式上放映。后来我懂得，固然在电影节上获奖是殊荣，安排在开幕式上放映，也是一种荣誉；而且，那两兄弟决定，那一届南特电影节，就以中国为主宾国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安排，就是谢晋电影回顾展，他们向中方提出借去谢晋的诸多代表作，在电影节期间每天放映，而且还要举办关于谢晋电影艺术的学术研讨会。那么，谢晋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，顺理成章，代表团已有了导演，就不再安排别的导演了。演员呢，应该派一位女演员去，但郑振瑶刚参加完菲律宾马尼拉电影节，还得了奖，那就让在《如意》中给她配戏，演格格丫头秋芸的陶玉玲去。三人成团，还有一名派谁呢？是南特那两兄弟提出来，请这部影片的原著刘心武去，他们说看了片子，觉得这部电影原著提供的基础非常好，他们也想让电影节别开生面，不仅请导演，请演员，这届要请个作家去，而且刘也是编剧。石方禹同意了。中国电影代表团就由团长谢晋、团员陶玉玲和刘心武，以及一名法语翻译，一行四人组成，电影局上报文化部，部里已批复。听了这么一番说明，北京市文联就同意我去法国。

先飞巴黎，住了一夜，就乘火车去往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南特，当时那是一个典型的西欧中产阶级为主的富裕城市，整个城市给人一种法式奶油水果蛋糕的甜腻感觉。主办方安排我们住进一个小巧而精致的酒店。开头没注意，后来翻译告诉我，那酒店的名字竟是殖民地。我很不乐意。但陪同我们活动的一位法国女士，学中文的，中国普通话说得蛮流利，我跟她抱怨：“怎么让我们住在殖民地？”她笑着解释：“不过是一种幽默。我们法国绝大多数国民都是厌恶殖民制度的，都是支持原法国殖民地独立的，阿尔及利亚等等，不都独立了吗？好比我们这里有一种最贵的香水，叫什吗呀？毒药！对，就那么个牌子，不过是一种幽默。”我就跟她说：“我进入不了你们这种幽默！”



一九八三年，谢晋、陶玉玲与刘心武（自左至右）在法国朋友家做客

我在新中国长大成人，对殖民地这个词反感，那位法国女士表示理解。但是酒店的服务是很到位的。每晚回到酒店，到柜台领房间钥匙时，柜台里的女士总是笑容满面，把很大一把铜钥匙递过来时，还指立在柜台上的一个录像带封套，意思是“今晚会在电视机里播放这部影片，欢迎欣赏”，但我们已经看了一天的电影，哪里还要看那个？

在南特，有幸看了许多亚洲、拉丁美洲、非洲的电影，也在谢晋电影回顾展中补了课，看了以前没顾得看上的，他 1955 年执导的《水乡的春天》和 1981 年执导的《天云山传奇》。也去谢晋电影艺术研讨会旁听，发言的洋人所讲，团里的翻译基本上能同步将意思告知谢晋和我们，我的总体印象，他们主要是分析谢晋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、他所展现的艺术才华和艺术个性。记得有个法国人在发言中，盛赞谢晋在《舞台姐妹》开篇时长镜头的运用，说真绝妙极了，摇镜中先展示故事发生的自然环境，绿水青山，梯田农舍，再展示那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景观——农田尽处见人烟，戴着竹笠的俗众在赶集，集市上的露天戏台上在唱戏，又从平移变成利用升降机形成的远观近看，一直移成近景：一个赌博摊档的赌徒们，剧中的戏班班主和尚阿鑫赌兴正浓，身后忽然骚动，有女子穿过人群逃跑，有手执绳套的男女在追捕她……发言者称，谢晋对长镜头的运用，堪与法国导演特吕弗 1959 年执导的《四百击》最后的那几分钟长镜头媲美。

在南特酒店，我和谢晋各住一室，没怎么聊天，后来主办方组织大家乘游轮游览，在船上，我才跟谢晋有比较深入的人际。我告诉他，我原来看电影，毫无专业眼光，看《舞台姐妹》，没有注意什么长镜头。谢晋说，其实改革开放以前，他也只看到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片子如《偷自行车的人》《罗马十一点钟》，对电影的蒙太奇还有些探究和实验。我就说蒙太奇的意思我大略懂得，就是电影艺术也就是剪辑的艺术，把一些镜头巧妙地接在一起，便形成了特别的叙事或抒情效果，比如三个镜头：一个人愁闷的特写，同一个人欣慰地微笑的特写，一棵大树的空镜头；一种剪接是先愁闷再大树再微笑，另一种则先微笑再大树再愁闷，含义便全然相反。谢晋再说《水乡的春天》的时候，

就只是注意蒙太奇。他拍《舞台姐妹》的时候，还没有机会看到法国新浪潮电影，甚至都不知道法国有个特吕弗在 1959 年拍了部《四百击》，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，也不清楚有个叫巴赞的电影理论家提出了对蒙太奇挑战的、提倡长镜头的，叫作记录学派的新理念。但《舞台姐妹》开篇的长镜头拍摄，他确是自觉的，是想做一种大胆尝试，不靠后期剪接，而是一气呵成地通过一个镜头来完成环境、时代、故事主体戏班的综合交代。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出国，当然也是第一次踏上新浪潮电影发源地的法国，他还没有看到《四百击》，不知道那最后令巴赞生发出一套理论的长镜头是怎么拍摄的。他说，长镜头的拍摄，你有了构思，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支撑，他拍那开篇的长镜头，技术部门费老大劲了，要长长的滑轨，还需要升降机。那时候是胶片拍摄，进口的彩色胶片非常昂贵，浪费不起，因此需要摄影机的机位非常准确，推拉摇移必须浑然天成……他回翻译：《四百击》这片名什么意思？翻译说出自一法国谚语：一个淘气顽皮的孩子要挨四百下打才能消除灾难，祛除恶魔，变成健康听话的儿童。特吕弗的这部片子的主角正是个“问题少年”。

从南特返回巴黎，那年头巴黎飞北京一周只有两个航班，我们等候飞北京的航班，可以停留三天。在巴黎酒店，我和谢晋住一个套间，共享一个卫生间。我已不得有机会在巴黎游览。可是约谢晋同游，他却说好静不好动，只有两次跟我们一起应邀到法国友人和华侨家里做客，但面对无论是真诚的赞美还是客套的捧场，他都付之沉默微笑。在酒店房间，我开他玩笑，说你名字里那个山西简称，该改成安静的静才是，他竟微笑颌首。他似乎总在喝酒。有国内带来的酒，也有巴黎华侨送的酒。我们那套间里总弥漫着酒香。为了让他能独享安静，我总不主动去他的房间。那一年谢晋已入花甲，他真正做到了耳顺。在北京，我听一些大体同龄的电影界人士说起谢晋，尊敬之余，又难免啧有烦言，说谢晋是他们以为为然的“海派电影”的领军人物，形成一种“谢晋模式”，说黄蜀芹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拍出的《青春万岁》，步他后尘，令人遗憾云云。谢晋知道这些议论，却毫不生气。南特电影节为他特办回顾展，对他

2 月中旬，家门口两棵樟树的果实又成熟了。早春含着湿气的冷风里，樟树籽争先恐后地从树上掉下来，噼里啪啦撒了一地，三四天就能扫出一大堆。它们大多成熟了，外皮起皱，摸上去，手感坚实；尚未成熟的籽含着一汪浆水，在地砖上摔成一滩黑色。有少量樟树籽掉进了东边几只种着绣球的花缸，有一些掉进了西边种着常绿珊瑚树的花坛。

3 月中旬，樟树开始落叶。时暖时寒的春风里，去年长出的叶子一片一片随风落下。到了 3 月下旬，落叶越发多了，每天都在地上铺出一张松松的、散发着樟木清香的地毯，似乎也扫不完。举目一望，枝头的老叶所剩无几，嫩绿的新叶尺寸尚小，无声地舞动着。

再过一个月，樟树枝头又会绽出微小的粉绿色花蕾，开出米粒大的花，在仲春的暖风里授粉，结籽。然后，开始长达十个月的成熟期。

不止一次，我在花缸和花坛里发现樟树的幼苗。每一次，我都把它们拔出来扔掉，心怀歉意。一棵樟树需要的空间太大了。

原始森林里的树木，都像这两株樟树一样，无师自通，自我繁衍的吧。在茂密的树林里，那些有幸萌芽，出土，长大的幼树，是如何跟孕育它们的母亲树争夺阳光、水分和空气的呢？假如高大的前辈没有被狂风吹折，也不曾被雷电击毁，幼小的它们，还有没有长高的机会？

对那些经历了千辛万苦才长大，然后孕育，开花，结籽，散籽的老树

的艺术成就给予极高评价，他也并不喜形于色。真个是宠辱不惊。

在巴黎，我每天约陶玉玲同游。陶玉玲 1957 年在《柳堡的故事》里饰演的二妹子、1964 年在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里饰演的春妮，嵌入了几代人的观影记忆，我很高兴竟能与她相识，成为游伴。我们不会法语，我只会说简单的英语，法国人对英语是不感冒的，但那年头法国人难得见到中国游客，我用蹩脚的英语问路，他们倒也能客气地用同样蹩脚的英语回应，双方居然沟通成功。就这样，我和陶玉玲一起参观了铁塔、巴黎圣母院、卢浮宫，卢浮宫极大，藏品极丰，我就重点询问米罗的维纳斯在哪里，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在哪里，依照人家指点，和陶玉玲一起都看到了。后来，我又回到了罗丹博物馆的去法，一起去看了罗丹雕塑的真品。还去了伤残军人荣誉院，里面有拿破仑墓。陶玉玲是个机灵人，我说谢晋可以叫成谢静，她则可以叫成陶灵。

在南特，我们俩应邀去了墨西哥电影代表团住的酒店，他们就在酒店大堂里举行招待会。墨西哥来了个女明星，我和陶玉玲都觉得很像我们在五十年代看过的一部墨西哥译制片《被遗弃的人》的主演，一度从墨西哥红到好莱坞的大明星陶乐赛·德里奥，想必是传承其衣钵的后起之秀。那女明星见开幕式上登过台的中国人来了，过来迎接，极为热情，我们语言不通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陶玉玲大方地与其用眼神与手势沟通，难道演员与演员之间会有一种超越口语的密码？她二人倒好像是他乡遇故知般，顿成闺蜜，那女演员招呼我们去吃墨西哥煎饼卷，亲自用餐巾纸拈了一个递给我，陶玉玲则及时递我一杯老舌兰酒，噫，倒好像是一对姐妹在招待我这么个外方人！

临返京的前一天，我回到酒店，谢晋主动到我房间里来，并不问我和陶玉玲又逛了哪些地方，而是握着酒杯，兴奋地跟我说：“心武老弟，我有个主意，说给你听听，你觉得如何？”忙问他什么主意，他说：“我想让北京人艺的童超演个军长，怎么样？”我吃了一惊，吓了一跳。童超？我从小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观众，几乎看遍了他们演出的剧目，童超扮演的别的角色我都没记住，只牢牢记得他在《茶馆》里演的庞太监，真是人木三分啊！但是庞太监，那是什么形象啊，三分像人，七分是鬼，阴阳怪气，腐朽不堪，解放军军长，找他演？原来谢晋在酒店房间里，哪里只是喝酒，他腿不动，脑子一直在动，我知道，他的下一部戏，是要把李存葆的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搬上银幕，而且知道他特约了与电影缘分极深的作家李準编剧，更知道他一贯重视演员的挑选，他要起用童超出演军长？我脱口而出：“呀！你是想突出奇兵吧？”他满意地笑了：“心武老弟你猜对啰，我看出来，童超他有一种潜在的特质，就是老到而威严，谁说他能只演庞太监？我要把他的另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！”后来，电影拍成上映，童超戏份不多，却活生生是个军长的范儿。

很惭愧，除了《如意》，至今我没有任何作品被拍成电影。但有此一片游，此生足矣！

2021 年 3 月 22 日 温翰奇

2020 年 11 月 24 日中午，我从手术的麻醉中一点点醒了过来，最初的朦胧意识中隐约飘现“浮过了生命海”六个字——那是父亲 1968 年出的一本书的题目。

父亲曹聚仁一生发表了四千多万文字，台湾的李敖先生自认中文写作天下无对手，但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：“这点上我比不上你老太爷。”

父亲的这些文字中集成出书上百种，若说“著作等身”并不为过。《浮过了生命海》可能是其中文字不多、看起来单薄的一种，却能经常吸引我去翻看几页，尤其在我也浮过生命海的今天。

《浮过了生命海》是父亲 1967 年重病入住九龙广华医院两个月间记下的文字，出院后继续写录，先作为报纸上他每天的专栏文章，次年成书。他人生第一次能从内里体察一所医院的众生相。

书中写道：“我力疾过海到了广华医院急诊部，虽未昏迷，却已瘫痪，但恍恍惚惚，觉得这是一个广华城。崇高的 12 层楼，组成了一座现代化新设备的大机构……用一譬喻来说：这是大型生命年子的修理厂。”

父亲 1950 年为全家谋生独自移居香港，一直没生过大病，没进过医院。不料年过六十开始苦缠身，由轻转重，一年里慢性肝炎扩展到胆囊，身体垮了下来，体重减去 60 磅（54 斤半）之多，瘦剩 80 几磅的皮骨，不得不进医院动手术。

这也让他有机会摆脱世间繁事息下来，再次思考生与死的人生大问题；上一次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中，作为战地记者每天都须直面生死。《浮过了生命海》一半记事，另一半写生死。他说：“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原是人生历程，我这回以 65 岁的小老头儿进了广华城，在我也是学了人生的一课。”“生病的经验……也和坐牢的经验一样，可遇而不可求，原是可宝贵的。”

我比父亲幸运，直到去年 73 岁才遇上“生老病死”中“病”这个坎。2020 年 1 月 31 日，完成在日本长崎的拍摄，我与老伴飞回上海。受疫情所困，原来整年游历全球整两圈的打算只得放弃，转为在上海和周边的采访拍摄，因而也有了体检的想法。

香港老人没有什么医保，我们已好几几年没做体检了，上次做胃镜还是 2013 年。年复一年拖着，对自己的身体不那么放心，但也没那么紧迫。直到去年 8 月有机会跟上海长征医院的朋友说起体检的事，马上得到安排。

第一天检查下来大致没事，一些指标偏高已好些年，知道如何对付。第二天一早再去做胃镜，全身麻醉。推进手术间刚做胃镜，医生就召唤我女儿进去说发现明显癌变。

就此开始，我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，与癌对抗成为我和家人的头等大事。先化疗四次，再动大手术切除五分之四的胃和周边已扩散的淋巴，伤口愈合后再放疗 25 次，



我也浮过生命海

曹景行

接着又化疗……

这八九个月间我也第一次有机会从医院里面来观察社会，观察当今医疗体系的运作。尤其是转去上海肿瘤医院作放射治疗期间，恰好遇上那儿确诊一例新冠阳性。那天，我和老伴如果晚两小时离开，就会同整个医院及隔壁的医学院一起被封在里面隔离两周。第二天我们接电话通知去检测核酸，没事，再转去浦东分院继续放疗，春节前夕又转回浦西本院。如此紧急关头医院为我们病患做出最快的安排，不知后面牵扯到多少医护人员的付出。为了补上封院损失的时间，他们春节没有休假，大年初四我完成最后一次放疗。

生癌与治疗，让我第一次直面并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。这时翻看父亲的《浮过了生命海》，会出现一种隔世隔代同他对话的念头，还想写一些文字，或以“我也浮过生命海”为题出书。

我也浮过了生命海，还在挣扎上岸，过程辛苦，但也很值得。每天都有新的体会，每天都从遭遇到的人和事中获得新的感悟。生命的力量实在顽强，科学的发展已让“带癌生存”变成越来越多人现实状态，甚至可以“带癌工作”。

最近我们摄制团队与长征医院外科大夫周海洋合作，在网上推出 11 集视频专题“肠久之计”，我以自己的病例请教周医生。作为科普也作为公益，效果不错，已有二百多万的阅读数，在相关榜单上居前。

接着，我与音乐界朋友钱世锦、李青约在上海大剧院，以当年引进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为题，录了一下午节目。与作家陈丹燕合作的项目有点规模，要拍摄到“五一”前后。当然，这期间我还要继续化疗。

治疗让我有机会结识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，还有陪伴他们的家人。我们相互交流，更是相互鼓励和支持。前不久我住院三天做第八次化疗，出院时邻床“病友”，一位刚要高中毕业的女孩拖住我合影。我们都笑得很高兴，发自内心的……

努力繁衍。因为天灾人祸，更因为某些未明的原因，地球上的动植物已经灭绝了很多很多。也许，还将灭绝很多很多。

科技欠发达的古代，人们信奉多子多福。但是，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的困境始终存在。一旦人口规模超过生产力的承受范围，为争夺粮食和其他资源，经常发生战争，导致人口减少。另据野史记载，秦代起，中原可能就有一种“花甲葬”的风俗。年满六十的老人被儿孙送入“瓦罐坟”“寄死窑”，日送一餐，日翻一砖。砖满之日，即饿毙之始。传说，是宋仁宗废除了这一陋习。华夏的农民真正得以饱腹，当是托庇于红薯、马铃薯和玉米的广泛种植。彼时，已是明朝中后期。

繁衍是生命的本能，这种本能总是能在新生命的生长和旧生命的存续之间，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。哪天，某个物种繁衍的平衡点被打破，这个物种就会灭绝……

吹面不寒的春风里，又一阵落叶浩浩荡荡地飘下，夹杂着晚熟的樟树籽。树梢高过三楼的樟树们，永远不会为繁衍之悖感到困扰。它们只是年复一年地孕育，开花，结果，散籽，脱下老叶，长出新叶，长高，长粗。

说句题外话，几乎所有的美，其初心，都是为了繁衍基因。比如孔雀开屏，夜莺啼鸣，雄狮斗殴，鲜花怒放，春草青青……没有任何一朵花是为那位佳人哪对情侣绽放的。用花比喻女人，比拟爱情，纯属诗人自作多情。

不过，不自作多情，能写出诗吗？



潇绿绿衣长

（国画）

马顺先